

清华史学译丛

# 飞翔的中国凤凰

中西文化交流史译文集萃

张绪山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史学译丛

# 飞翔的中国凤凰

中西文化交流史译文集萃

张绪山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9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翔的中国凤凰:中西文化交流史译文集萃/张绪山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清华史学译丛)

ISBN 978-7-302-43548-8

I. ①飞… II. ①张…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798 号

责任编辑:马庆洲

封面设计:何凤霞

责任校对:王淑云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mailto: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13 字 数:190千字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 目录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1
希腊化时代恰卡尼安的筑城方法·····	20
研究拜占庭和中亚关系的新材料·····	32
罗马、萨珊波斯与隋唐中国:统治贵族之间的跨文化互动·····	37
拜占庭、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西方——丝绸经济和跨文化艺术互动·····	77
10—13 世纪泉州文化与形态中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142
飞翔的图案——拜占庭帝国中期的中国凤凰鸟·····	165
编后记·····	201

#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苏] B. M. 马松

译者：孙危（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苏联考古学家对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巴克特里亚、粟特、帕提亚和花刺子模的文化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它们的城市文明、文字的发展、货币的流通以及商品经济，而且还要研究这些现象在当地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现象都是伴随着阶级社会出现的，即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中亚地区的征服而出现的。但在中亚南部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城址和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灌溉系统使我们确认，该地区阶级社会出现的时代应该更早。这方面的情况还可从《阿维斯陀经》中得到证实，经文中提到，巴克特里亚地区在阿契美尼德时代以前就已存在着非常强大的政治同盟<sup>①</sup>。

在研究中亚古代文明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它的特点、它与其他古代文明的关系，以及它在古代世界中的历史地位。据此可将当时的文明分为两个基本体系：伊朗—美索不达米亚体系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体系。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受到西亚地区的强烈影响已得到确认，莫斯特

---

\* 本文译自《苏联考古》1964年第1期。

① 阿维斯陀经中记载的社会传统结构是：家庭村社—氏族—部落—国家。在米合勒·雅什塔中也同样提到了国家产生后的五种社会成员。其统治者被称为“众王之王”，与之共存的还有高级贵族议事会。由此看来，高级贵族议事会对最高统治者存在着一种限制作用。（参见I. 戈舍维奇：《米底的阿维斯陀赞美诗》，剑桥大学，1959，第83、295、298~299页（英文））。类似的统治联盟，即几个统治者一起来履行最高权力的形式，可能存在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巴克特里亚地区以前。

文化在中亚地区分布的非常广泛，在与中亚邻近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也都发现了莫斯特文化的遗物。奥克拉德尼科夫还从捷希克塔什遗址发现的材料中找到了西亚文化的影响<sup>①</sup>。而这种联系也正是中亚莫斯特文化的主要特点<sup>②</sup>，同时也是中亚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该地区的中石器文化以里海沿岸<sup>③</sup>和塔吉克斯坦<sup>④</sup>发现的遗存最为著名。这里中石器文化的特点是流行几何状的细石器，这种细石器的发展道路基本上与里海沿岸和伊拉克北部同类遗物的发展历程相相似。

西亚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是伴随着新的经济形态的出现而出现的，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建立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分布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纳吐夫文化<sup>⑤</sup>（公元前 9000 年—公元前 8000 年）与伊拉克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遗址（公元前 9000 年—公元前 8000 年）都呈现出了野生植物采集和动物驯养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场景（其中在伊拉克的日维一切米—沙尼达勒遗址中发现了山羊的骨骼，而在纳吐夫晚期文化遗址中则发现了可能是小型的有角类动物的骨骼）。于是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5000 年诞生了一系列早期农业文明，而且从现有材料来判断，这些农业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具有多中心起源的特点<sup>⑥</sup>。近东地区的农业人群和畜牧业人群中出现了专门的狩猎者、捕鱼者和采集者表明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而历史发展的不均衡性也使这种分工不断加剧。目前我们对亚洲

---

①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捷希克塔什岩穴中发现的莫斯特文化居址和尼安德特人墓葬》，莫斯科，1949 年，第 81 页；B. A. 拉诺夫：《关于中亚旧石器时代地层学的位置问题》，见《塔吉克斯坦地理学发展的新阶段》，杜尚别，1962 年，第 36 页。

② 在与印度北部接壤的地带发现，这里受到了著名的索安文化的影响（参见 B. A. 拉诺夫：《1959 年在卡拉—布拉高地进行的考古工作》，《塔吉克苏维埃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报告》，1961 年第 31 期，第 28 页）。

③ 除此以外，发现这类遗迹的地点还有：巴尔干半岛、克拉斯诺夫半岛（包括德热别勒、达姆—达姆一切什蔑和卡伊留等地点）、阿斯特拉巴德洞穴（包括霍杜、卡里—卡马勒邦德等地点）。

④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塔吉克斯坦石器时代的遗迹》，《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1958 年第 66 期，第 42~58 页、第 70 页。

⑤ 纳吐夫文化以在尼尔三角洲地区发现的燧石工具而著称，此外在小亚地区南部也发现过这种文化。

⑥ V. 马松：《中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群》，《第六次国际史前及原始社会科学大会苏联考古学家会议报告》，莫斯科，1962 年。（英文）

的两类地区进行了观察研究，即伴随着经济生产和文化快速发展的定居农业地区和地域广阔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分布的地区，其中后者还没走出攫取经济的范围。这两类地区的分布和相互关系是通过这一历史时期的诸多特点来确定的（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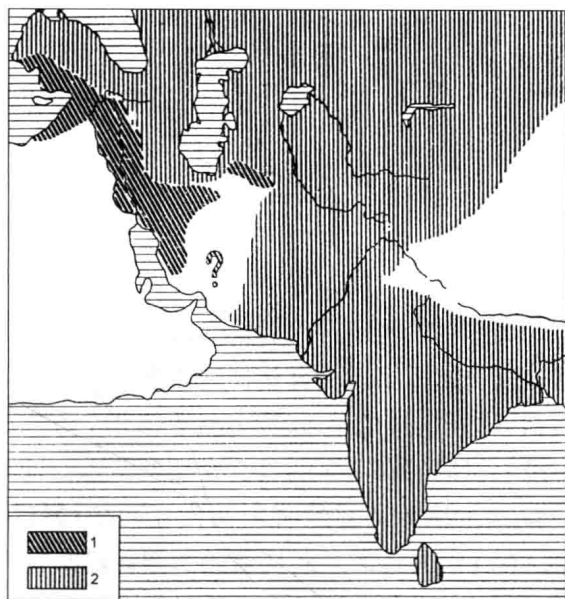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5000 年的西南亚地区  
1. 定居文明；2. 渔猎和采集文明

这两类地区之间的界线经过了中亚地区。在中亚的西南部出现了早期的农业文明——哲通文化，它是向新的经济形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当时已几乎覆盖了整个近东地区。哲通文化是现知中亚地区最古老的定居农业文明，它出现在科佩特山山麓地区是由一系列要素促成的。首先这里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和具有原始形态的家畜，其次是这里的生态环境对于早期的灌溉农业来说非常适宜，第三条是这里与当时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伊朗和伊拉克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sup>①</sup>。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中亚西南部地区在中石器时代就已具有了发展农业

<sup>①</sup> 不久前在克尔曼沙地区发现了与卡里姆沙希尔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的遗迹。

的必要条件（在加里—卡马勒班德遗址中就发现了公元前 7000 年的经过驯养的山羊）。

哲通文化的先民以建造黏土建筑和制作平底陶器而著称，他们还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养山羊，此外他们还得依靠狩猎所得作为补充才能满足肉食方面的需求。在哲通文化的基础上，中亚西南部的定居农业文明从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之间逐步发展起来。这里还出现了铜质工具、驯养绵羊、猪以及大型有角牲畜，狩猎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减退（以纳马兹加一至二期的遗迹最为典型）。新的经济形态成为了人口快速增长和文明进步的动因。人口迁徙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大量出现的装饰纹样精美的彩陶、小型的陶雕像以及带有壁画的殿堂庙宇也表明当时的文化已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亚西南部的诸多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早期农业文明分布区，这一区域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印度。它具有很多非常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陶器的形制、纹饰以及小型雕像几个方面更显突出。中亚西南部的这些遗址与伊朗的农业文明具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具有间接的联系。在经济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关于公元前 4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各地区之间交流的加强，已从这一时期遗迹中发现的大量青金石得到了印证），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居民的迁徙对中亚西南部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均产生了影响。其中中亚地区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安诺文化中就似乎有伊朗西拉克一期文化的影响<sup>①</sup>。公元前 4000 年在近东地区广泛流行的是欧贝德文化，该文化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欧贝德文化的陶器似乎影响的范围非常广，而该文化中的圆形房屋则向东一直波及到了安诺文化<sup>②</sup>。而且纳马兹加二期文化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山羊形象和艾拉姆文化<sup>③</sup>的彩陶上的几何图案也与欧贝德文化有一定

---

① B. M. 马松：《哲通文化》，《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考古调查成果集》，第十卷，阿什哈巴德，1961 年，第 68 页；И. H. 赫洛宾：《达什勒德日遗址丘与土库曼斯坦南部铜石并用时代的农人》，《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考古调查成果集》，第十卷，第 169 页。

② B. M. 马松：《欧贝德文化的东方变体》，《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报》，第 91 期，莫斯科，1962 年。

③ B. M. 马松：《中亚南部地区的铜石并用时代》，莫斯科—列宁格勒，1962 年，第 21 页，图版二十。



的关联。但这些影响和关联目前还没有人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到了下一个时期，即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上半叶，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伊朗中央地区的居民此时向中亚西南部地区迁徙。虽然外来居民很快就被土著居民完全同化，但前者的迁徙还是能通过彩陶上的花纹图案、陶器等一系列内容看出来<sup>①</sup>。可以说，到处都出现了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文明的直接影响。当然，这种外来文明是与当地文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女性雕像就是体现这一关系的例证，从这些雕像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所受到的欧贝德文化传统的影响。但这些雕像并不是如欧贝德文化中的雕像一样，采用站立姿态，而是和早期中亚地区遗存中出土的雕像一样，采用坐姿的。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明对中亚地区的文明产生了诸多影响，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奇。因为中亚西南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长期以来就同属于一个经济文化圈（图 2）。而中亚的大部地区，包括整个河中地区，在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之间是归属于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文化圈的。

从里海沿岸的德热别里岩洞的上层文化层以及其他一些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所体现出的特点来看，它们沿袭了当地的中石器文化的基础。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经济形态，与中石器时代一样，基本上仍为狩猎和采集，可能还有少量的家庭畜牧业，比如饲养山羊<sup>②</sup>。

中亚地区有相当大的区域由于同属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分布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共性。该文化遗迹是由 С. П. 托尔斯托夫于 1939 年在花刺子模地区首先发现的，该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有：乌兹博伊河流域、马汉河流域、哈萨克斯坦西部以及泽拉夫善河下游地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镞也曾出土于德热别里岩洞的上层文化层中，但后者与前者遗迹中出土的陶器

---

① В. М. 马松：《公元前 3000 年的中亚和伊朗》，《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简报》，1963 年第 93 期；В. И. 萨里安伊季：《安诺文化东部地区遗迹的地层学问题》，《苏联考古学》，1960 年第 3 期，第 149—150 页；И. Н. 赫洛宾：《卡拉遗址丘出土陶器上的牛和鹿的形象》，《苏联科学院物质文明史研究所报告及野外研究简报》，1957 年第 69 期。

② В. И. 查勒奇：《德热别里洞穴遗址发现的动物种群材料的初步研究》，《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考古调查成果集》，第七卷，阿什哈巴德，1956 年，第 22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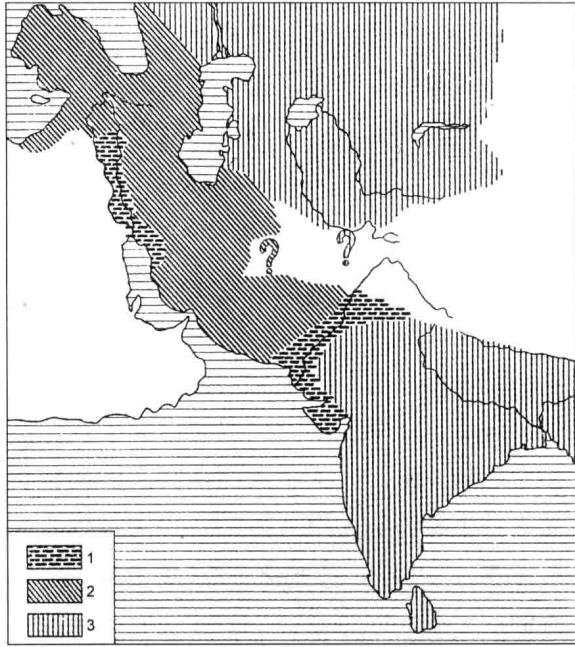


图2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西南亚地区  
1. 城市文明；2. 定居农业文明；3. 渔猎和采集经济

却差别颇大。就克尔捷米纳尔文化而言，其经济以渔猎为主，其文化遗物主要是：细石器、圜底陶器（早期阶段）和半地穴式房屋<sup>①</sup>。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居民后来还向北迁徙，对鄂毕河下游和乌拉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影响<sup>②</sup>。由此也就揭示了亚洲大陆的新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渔民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特点是由其所处的位置，即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的交界处来决定的。这里的居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不断受到邻近地区

<sup>①</sup> 采自1963年3月21日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学部会议上M. П. 格里雅斯诺夫所作的报告。

<sup>②</sup> С. П. 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刺子模》，莫斯科，1948年，第63~65页；В. И. 切勒涅措夫：《鄂毕河下游古代史》，《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1953年第35期；Л. Я. 克里热弗斯卡娅：《新石器时代与早期金属时代的切巴勒古里二号居址》，参见《乌拉尔地区考古问题研究》，1962年第2期，第31页，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高度发展的文明的影响。这其中可能还涉及农业文明地带的部族迁徙的问题<sup>①</sup>。克尔捷米纳尔文化早期陶器上的刻划和戳刺纹饰以及器形式样都体现出了其所受到的彩陶文明的影响<sup>②</sup>。在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一个居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带有各种式样的流的陶器，这些陶器与伊朗东北部的农业文明（沙和遗址丘）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sup>③</sup>。来自沙和遗址丘的陶器残片曾在德日别里出土过，这表明花刺子模地区与其以北地区之间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存在着一条传统的道路。

由此就可以很自然地断定，正是由于这些文化上的联系以及北方部族的迁徙活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在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晚期阶段出土的铜器，表明畜牧经济中有了金属冶炼业的萌芽。而在泽拉夫善河流域发现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先民使用的燧石镰刀，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算多，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原始磨盘<sup>④</sup>。

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这两种文明（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类型和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类型）发展的基本方向的研究是不是一种人为的有限的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考虑到与这两种文明并存的一些古代文明中心，例如阿富汗、印度，甚至还有中国等等。

阿富汗与印度西北部，当然，这里指的是现代的巴基斯坦，与中亚南部地区的定居文明居民一起进入了半农半牧地带。这些半农半牧地区的居民已经能够制造彩陶。正如现有资料所能证实的，这些地区过渡到新的经

---

① 参见关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与达罗毗荼人有关的人种从南部地区迁徙到花刺子模地区的推测（T. A. 特洛费莫娃：《从古人类学资料看古代花刺子模的居民》，MXЭ，第二卷，莫斯科，1959年，第5页；C. П. 托尔斯托夫：《古代的阿姆河和雅克萨勒特河三角洲地区》，莫斯科，1962年，第46页）。但遗憾的是，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人类学材料目前尚未公之于众。

② A. B. 维纳格拉多夫：《关于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与其邻近的南部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问题》，《苏联民族》，1957年第1期，第34~42页；B. M. 马松：《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早期农业文明中心》，《土库曼斯坦南部地区考古调查成果集》，第十卷，第30页、图13、第33页。

③ A. B. 维纳格拉多夫：《苏联科学院花刺子模考古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材料》，1957年，MXЭ，第4卷，莫斯科，1960年，第70~71页；C. П. 托尔斯托夫：《古代的阿姆河和雅克萨勒特河三角洲地区》，第32页。

④ Y. 伊斯拉莫夫：《泽拉夫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提要，列宁格勒，1963年，第13~14页。

济形态的时间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伊朗地区以及中亚西南部地区要晚一些。就印度河流域而言，最早的定居农业文明居址的时代从碳十四测年材料来看，为公元前 4000 年中叶（公元前 3350 ± 200 年）<sup>①</sup>，而这一地区绝大多数早期农业文明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 4000 年末至公元前 3000 年初。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地区在过渡到生产型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原因是受到来自伊朗高原的移民<sup>②</sup>的影响，因为伊朗高原的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要比这些地区完成得更早。在阿富汗南部的发现的姆尼吉加克居址的最下面的一层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 4000 年末，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完全是一种复合的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居址中出土的彩陶与西阿勒克发现的彩陶非常相似<sup>③</sup>。公元前 3000 年伊朗北部和中亚南部地区的农业文明对阿富汗和印度地区产生了影响<sup>④</sup>，但后两个地区却并没有给予前两个地区影响<sup>⑤</sup>。

公元前 4000 年—公元前 3000 年的中亚和印度地区存在着两类人群，一类为定居农业人群，另一类为渔猎人群。其中后者占据了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目前我们主要是从著名的古德让勒塔特类型遗迹中了解到相关的情况<sup>⑥</sup>。该类型遗迹最重要的特点是广泛使用燧石制造的、几何状的细石器，形状多为梯形和三角形。此外，仅有一处地点发现了一些烧制火候不高的陶器碎片，这也表明陶器在该文化中使用得还不普及。C. П. 托尔斯托夫还注意到一点：克尔捷米纳尔文化还侵入了古老的印度文化圈<sup>⑦</sup>。

---

① W. 费尔赛维斯：《巴基斯坦西部的昆塔谷地的发掘》，纽约，1956 年，第 356 页。（英文）

② B. M. 马松转引 W. 费尔赛维斯：《巴基斯坦西部的昆塔谷地的发掘》，《苏联考古》，1960 年第 3 期，第 352 页。

③ J. M. 凯撒：《姆尼伽克的发掘》，巴黎，1961 年，第一卷，第 118 页。（法文）

④ 关于伊朗的影响可参见 C. 毕科特、Г. 查伊勒德及 Л. 马克、卡乌尼等人的相关著作。笔者和 B. И. 萨里阿尼季的相关论著则阐明了中亚文明对俾路支斯坦北部地区的影响。

⑤ Ж. M. 卡萨里错误地认为，在中亚南部地区，自纳马兹加二期文化开始，出现了适应克维塔风格的文明。但按照相对和绝对年代，这个时代是在俾路支斯坦地区出现克维塔风格彩陶之前的。另外，俾路支斯坦地区的陶器纹饰缺乏中亚陶器的最主要的一种纹饰——由菱形和四个三角形组成的十字形。很显然，来自伊朗的文明首先对中亚地区产生了影响，随后又对阿富汗南部和俾路支斯坦北部地区产生了影响。目前 Ж. M. 卡萨里自己也认识到了这种错误。

⑥ B. 萨波罗：《印度名流》，巴洛达，1958 年，第 71~77 页。（英文）

⑦ C. П. 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刺子模》，莫斯科，1948 年，第 65 页。

这个结论还表明，与印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样，中亚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以渔猎为生的人群，这些人还是当时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之间的联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花刺子模地区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先民与创造古德让勒塔特文化的居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文化联系。他们所处的区域为面积辽阔的、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而且他们并不相邻。在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还分布着基萨尔文化，它与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之间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别。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基萨尔文化并没有通过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与其他文化产生联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克尔捷米纳尔文化的燧石工具与印度文明的燧石工具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对此 A. B. 维诺格拉多夫已经提及。还有很多论著探讨了安诺文化和仰韶文化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中国出现的彩陶文化是受西方文明影响所致<sup>①</sup>。但吉谢列夫则认为，仰韶文化是与西方那些文化平行发展的一支文化，其所具有的那些所谓西方文化因素偶然性的成分要更大一些<sup>②</sup>。还有一些人想通过对安诺文化的彩陶风格及器形的分析，来说明仰韶文化和特立波利耶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已被排除掉。可以认为，各个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装饰图案都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应该理解为发展历程的相似，而不是彼此之间具有联系所致。该理论还由于近年来的一些新发现得到了巩固，这些发现为我们清晰地描绘出了早期农业文明不断扩展的历程。中亚地区的先民，在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之间已能制造彩陶，但他们在扩张到卡拉库姆沙漠的南部边缘地带时却停顿了下来，而这里距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带有数千公里之遥<sup>③</sup>。

---

① R. J. 布拉德伍德：《近东与方德森的文明》，奥瑞格，1952 年，第 22 页，图 11，地图。（英文）

② C. B. 吉谢列夫：《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苏联考古》，1960 年第 4 期，第 246 页。

③ 关于中亚地区的彩陶与东突厥斯坦的彩陶之间的某些相似性的问题，吉谢列夫在他的《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一文中提到，公元前 2000 年末至公元前 1000 年初时，在费尔干纳地区出现了丘亚文化，该文化可能或多或少地与同时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联系。可参见：B. M. 马松：《中亚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研究》，《苏联考古》，1957 年第 4 期，第 53 页；Ю. А. 查德涅波洛夫斯基：《费尔干纳地区的古代农业文明》，《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1962 年第 118 期。

仰韶文化的起源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首要原因是仰韶文化以前的考古遗存的研究还很薄弱，但从其与近东地区农业文明的对比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从时代上来看，仰韶文化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sup>①</sup>。如果考虑到其文化层的厚度达到了5~6米，就可以将其肇始阶段推进到公元前4000年。而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近东地区，当然也包括中亚，此时铜的应用已非常广泛。及至公元前3000年初期，苏美尔和埃兰地区均跨入了青铜时代。与此同时，仰韶文化对金属的应用还不是很普遍，当时还处在新石器时代。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亚以及印度西北部地区，都出现了用泥砖建造的房屋。而此时在仰韶文化中所见到的房屋都是一些方形和圆形的小茅屋，房屋内的地面上及墙壁上还抹有黏土。这种小茅屋与印度中部地区公元前2000年铜石并用时代的房屋非常相似，这个特点可能表明处在北回归线上的印度与中国东部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具有相似性（包括湿润的气候、季风）。近东地区从事农业的人群在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之间就已培育出了大麦和小麦，同时这里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驯养的山羊。而中国黄河流域的居民则培育出了水稻和粟，他们所驯养的家畜主要是狗和猪<sup>②</sup>。

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即黄河流域发生的向生产型经济的转变与近东地区的文明关系并不大<sup>③</sup>。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古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属蒙古利亚人种，他们与现代中国人的亲缘关系很近。而它们与近东地区早期农业文明的各类人群差别则非常明显。此外，在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就已出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陶器。黄河流域的早期农业文明出现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并且是独立起源的。就像秘鲁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向

---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莫斯科，1958年，第22~38页。

② 庞西兴：《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9年第2期，第2~4页。（英文）

③ 关于中国农业文明独立起源的观点，有很多现代考古学家都进行了论述，可参见：安特罗波罗季维金基金出版物，纽约，1962年。而Н. И. 瓦维洛夫在对古植物相关材料研究的基础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生产型经济转变一样。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加强对中国东部地区在向生产型经济出现的研究。目前在黄河中游地区已发现了一系列的前仰韶文化时代的遗迹<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一些与仰韶文化有联系的文化因素（例如彩陶、绳纹和磨光石斧等）。而其中最特点的则是燧石制成的细石器<sup>②</sup>。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我们目前还知之甚少。

如此来看，中亚南部地区的早期农业文明在与近东文明类似的文化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而中亚北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地区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些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后来的青铜时代。

而此时在东方的各个经济文化带之间的势力消长，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兰地区的农牧公社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文明也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图3）。表现形式就是出现了很多高度发达的城市、巨大的纪念性建筑以及文字。此外，这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还形成了早期的阶级社会。稍晚即公元前2400年左右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印度河流域，这里产生了哈拉帕城市文明。这两处城市文明区域之间是比较落后的且地域辽阔的农牧文明地带，这一地区与这些城市文明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加剧。苏美尔、埃兰和哈拉帕文化的迅猛发展，是以这些地区农产品的极大丰富为首要条件的，而灌溉农业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兴修了很多大型的水利工程。目前我们已从苏美尔的文献材料中了解到了那里的农业概况，这里通常情况下大麦的产量是播种数量的36倍，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04~105倍。而在中亚西南部地区，那里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000年之间的早期农业公社时期的小麦产量，通常仅为播种数量的7~8倍，大麦则仅有4~5倍。在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的封闭的山谷地带，这里的气候条件不佳，对农业发展的限制很大。与此相反，在信德等地区却集中了哈拉帕文明的大量古迹，这里至今仍是印度的粮仓。与俾

---

① 程特昆：《中国考古》（第一卷），剑桥大学，1959年，第68~69页。（英文）

② 我在这里并不同意C. B. 吉谢列夫的观点，他对黄河中游地区的前仰韶文化时代的遗迹和仰韶文化遗迹之间的传承关系持怀疑态度（C. B. 吉谢列夫：《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中国》，第245~246页）。

路支斯坦地区相比，这里每年能收获两季。看来，类似的农业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黄河流域也出现过。中国安阳的考古发掘证实，这里在公元前 14 世纪—公元前 12 世纪时就已存在着早期的阶级社会，其证据是这里发现了很多纪念性建筑、规模宏大的王陵以及举世闻名的甲骨文。这样看来，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时，仰韶文化的农业发展水平还是要逊色于同时期的伊朗、阿富汗和中亚南部地区。毫无疑问，中国的农业圈文明发展起来的时间要晚一些，中国早期阶级社会的形成时间则要更晚。中国在公元前 18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之间还处于类似西亚的杰姆代特奈斯尔时代（公元前 3200 年—公元前 2900 年）和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公元前 2700 年—公元前 2600 年）的那种铜石并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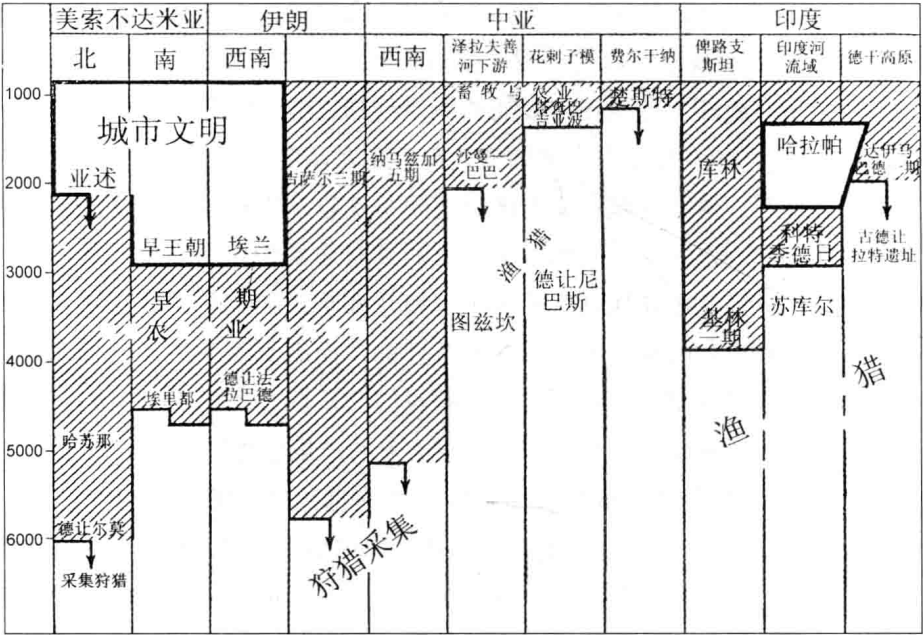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各个历史文明地区的比较

中亚西南部的定居农业公社从地域上看，与伊朗、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这些地区同处一个文化区域，这里是苏美尔—埃兰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分布的边缘地带。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这一时期，中亚西南部地区的原始公社制开始逐步瓦解，这与公元前 4000 年发生在两河流域南



部地区的历史进程基本相同。此时在中亚地区出现的早期农业，从考古学上来看，就是规模较大的居址，这些居址的面积能达到 100 公顷，居址四周还环绕着用泥砖构筑的围墙<sup>①</sup>。这些居址中发现了陶窑、陶圈、红铜和青铜制品，这表明当时手工业已得到发展。在伊朗东北部地区也发现过这种居址，其中之一就是 19 世纪发掘的特尤列尼克遗址丘，这里出土了黄金、铜和石制品。这些遗物被命名为“阿斯特拉巴特”，并生动地体现出了当时财富积累的过程<sup>②</sup>。对面积较小的吉萨尔遗址丘（其面积为 1.5 公顷）的发掘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这些现象<sup>③</sup>。富有人士墓葬的与众不同表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相当大。而规模巨大的独体房屋、种类繁多的物品，其中包括使用了金属浮雕工艺的物品，可能这是一个统治吉萨尔的富有家庭的住宅。对姆尼伽克的发掘表明，其可以分为四期，是一处居址<sup>④</sup>。居址周围环绕着高墙，而居址中央则是一座建在高台上的规模宏大的建筑。在这座建筑的正面还有半圆柱用来装饰。这处居址附近还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其平面形状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神庙非常相似。这里还出土了巨大的石像头，从风格上来看，与哈拉帕文化的塑像很近似。姆尼伽克有可能是当时坎大哈绿洲地区的一个中心，而发现的这处建筑，则是处于古印度河文明边缘地区的一处王公的宅邸。

但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阿富汗，或是中亚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一时期与苏美尔、埃兰、哈拉帕以及中国商文化这些属于早期阶级社会类似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发展的迹象。而在纳马兹加遗址丘、吉萨尔遗址丘以及姆尼伽克发现的印章上的图案，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几何纹样。其社会发展水平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初期处于一个停

---

① 这些事实是由 A. Ф. 卡尼雅林和 A. A. 马鲁先科于 1959—1960 年间在阿勒德遗址丘发掘所得的考古材料所证实的。

② C. A. 博德：《阿斯特罗博德街区新近发现的墓葬》，《考古》，1844 年，第 30 期。（英文）

③ E. F. 斯库米特：《吉萨尔遗址丘的发掘》，达姆根，费拉德尔菲亚，1937 年。（英文）

④ Ж. М. 卡萨里认为姆尼伽克第四期文化的时代为公元前 3000 年中期，上限不超过吉萨尔三期文化的最早年代，同时他忽视了 B. 费勒谢勒维斯对俾路支斯坦地区考古遗迹的分期成果（参见 J. M. 凯撒：《姆尼伽克的发掘》，巴黎，1961 年，第一卷，第 27、69~70、110~119 页）（法文）。我们认为姆尼伽克第四期文化的年代应为公元前 3000 年末至公元前 2000 年初。